

革命史資料

革命史資料

1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革命史资料》编辑部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一九八七·北京

责任编辑：郭丽卿

标题书写：赵丛义

革命史资料

18

《革命史资料》编辑部编

(限国内发行)

*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北京市鲁古装订厂装订

*

1987年10月第一版·1987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875 字数：174千字

印数：1—3000册

ISBN 7-5034-0006-4 /k·0007

统一书号：11224·251 定价：1.50元

目 录

乔希章 都爱国	博大的襟怀	
	——徐向前教育改造敌俘二三事	(1)
冯正武	策反汪伪“财神”邵式军纪实	(11)
胡鲍淇	弃暗投明的邵式军	(19)
张友渔	有关华北救国会的一点回忆	(41)
史立德	一二九运动前后的中国大学	(47)
阎林民	我在太原参加五卅运动的片断 回忆	(63)
肖彦	关于本溪特殊工人地下组织的回忆	(69)
冯锡蕃	从商会会长到八路军的供给工作者 ——回忆贺龙同志对我的关心和信任	(77)
童世光	怀念商救会长陈锐夫烈士	(100)
张斧		
马白山	琼崖革命战争的重要决策	(104)
黄耀南	湘鄂赣边区合作谈判及平江惨案	(112)
赵东寰	东北军六九一团改编前后	(121)
王瑞堂	改编华北“剿总”联勤总部监 护四团	(131)

- 何 穆 延安中央医院是怎样创办起来的…… (140)
稗田宪太郎 和八路军在一起生活的八年 …… (159)
何一民 留学苏联片断…………… (182)

人 物

- 曾长秋 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者缪伯英 …… (190)
周建纯 皖北工农红军副总指挥杜聿德 …… (202)
徐占林 记海外归来的郑戈同志 …… (207)
杜 娟

博大的襟怀

——徐向前教育改造敌俘二三事

乔希章 都爱国

1947年6月，徐向前同志抱病就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从这时开始，他连续组织了运城战役、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太原战役等一系列歼灭战。这期间，军区野战军主力分别随刘邓和陈赓谢富治到外线作战，指挥所首长也仅剩下徐总一人，作战、训练的任务十分繁重，但他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纵观整个战局，非常重视改造战俘，特别是对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工作，充分体现出他的政策水平和宽阔胸怀。

我们在徐总身边工作的时候，经常听到他对俘虏政策的论述。他说：“我们的兵源主要靠人民群众、翻身农民踊跃参军。但改造俘虏，争取在7天到半月内把他们补充到我们的作战部队中去，这是解决战斗中及时补充兵员，保证我军战斗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手段。”因此，他要求部属必须十分严格执行我军的俘虏政策，只要敌人放下武器投降，就以礼相待，不杀、不打、不骂、不歧视、不搜腰包、不侮辱人格，给予他们人道的和阶级的教育，使他们能在新旧两个军队、两种对比中提高认识，选择自己今后应该走的道路。徐总说：“这些人大部是被抓壮丁抓来的，大都是贫苦阶级兄弟，只要他们接受教育，懂得为谁当兵才有出路，他们就会变成为有理想、有阶级觉悟的革命战士。”

对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徐总更是十分关心，他教育部属要特

别注意对这部分人的帮助和改造，并正确使用，发挥他们的才能。记得太原战役开始不久，晋绥军区奉贺龙司令员之命，把在晋中战役中脱离战场后又被我军俘虏的阎锡山工兵二团团长邢蔚送到第18兵团来。徐总对邢蔚非常重视。邢是阎锡山部的老工兵，曾在阎的碉堡建设局担任太原城防碉堡建设科科长，与阎留用的日寇碉堡专家一起主持设计、构筑过太原城防碉堡工程，对这一工程的位置、结构、火力配系十分熟悉，被称为阎锡山的“碉堡专家”。徐总除亲自接见他，了解太原的城防工事外，还指示情报科要很好帮助他，给予足够的信任，大胆使用他，放手让他工作。徐总还特别关照有关领导给他团级待遇，发团级服装，和兵团的科长们一样吃“中灶”。邢蔚受到宽大政策的感召，感激徐总对他的亲切关怀，工作十分努力。他精心绘制各种碉堡的平面、立体、解剖和写真图，摆沙盘，编写文字说明材料，向机关和部队首长介绍太原敌情和城防工事配系工程情况，尽其所知，毫无保留，为我们了解太原城防工事和增加碉堡构筑知识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被称为太原城防工事的“活字典”。太原战役后期，邢蔚积极要求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徐总根据他的思想觉悟和政治表现，批准吸收他参加人民解放军，正式成为人民军队的干部。

进行临汾战役时，临汾守敌最高指挥官是阎锡山的第六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兼晋南地方武装总指挥梁培璜。在徐总指挥我军夺取临汾城垣的战斗期间，此人坚持顽抗到底，给蒋介石和阎锡山发通电，声言“誓与临城共存亡”。并在作战期间，制造和施放毒气，实为战犯。对梁培璜的倒行逆施，我攻城军民恨入骨髓。战士们编快板说：“战犯梁培璜，年纪五十五，又高又瘦黑皮肤，外强中干纸老虎，高鼻梁，日本胡，河南口音要记住……”1948年5月17日，我军克城后，在俘虏收容处和敌尸堆里都找不到这个战犯。徐总下令严密搜索，封锁河道路口，不让梁培璜跑掉。原来，梁在我总攻城垣时，仓皇从西门逃出，他来不及

脱衣脱鞋，就泅渡汾河。上岸后，正碰上搜索部队，吓得一头钻进麦田里，不敢动一动，因天冷衣湿，胆颤心惊，缩成一团。见到我搜索部队，他举着双手呼喊：“不要打，不要打，我缴枪投降！”并连连哀求：“请把我带到贵军指挥部吧，我就是梁培璜。”我军战士说：“就凭你河南口音，日本胡，我们就知道你是梁培璜啦。”

一般的说，我们做情报侦察工作的，不放弃任何审询重要战俘的机会，特别是在作战间隙中，急需为下一个战役准备各种情报资料。可是，临汾战役结束后，梁培璜还没有送到指挥所以前，徐总就指示参谋人员不要随便找梁培璜谈话，以免谈话不慎，增加这位敌方总指挥的思想负担。只是在徐总自己召见梁培璜时叫我们也参加，注意满足我们业务部门的需要。

记得徐总第一次审询梁培璜时，梁的精神非常紧张，但表面上又装得有些傲慢。当他从徐总浓重的山西口音又夹杂一些四川、湖北方言的问话里，意识到出现在面前的即是战胜他的对方总指挥徐总时，下意识地霍然站起来，回话语结，手指有些颤抖。

徐总和蔼地说：“坐下谈嘛，可以随便些。”

梁培璜回答却是：“是，是，是，我叫梁培璜。”

我们在场的参谋人员忍不住要发笑，徐总严肃地看了我们一眼。我们立刻明白了，他不愿使梁培璜感到屈辱、尴尬或受到奚落。

徐总问梁培璜：“你以为临汾孤城能够守得住吗？”

梁培璜低着头，有些局促地回答：“是的。临汾是卧牛城，易守难攻，历史上还没有人能攻破它。”

徐总指出：“未见得吧？1936年工农红军东征，可以说已经占领了临汾，只是为了顾全大局，争取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才放弃临汾，回师陕北的。”

梁培璜辩解说：“那时城防薄弱。这次我以为贵军没有重武

器，真想不到你们的‘上飞机’（指坑道作业爆破）是这样厉害。”

徐总笑了起来，说：“你梁培璜不也挖了许多坑道，来破坏我们的坑道作业吗？”接着，徐总真诚地告诉他：“坑道你我双方都在挖，厉害的不是坑道——‘土飞机’，是人民，是人心向背，是我们战士的英勇顽强。国民党和阎百川（阎锡山）要打内战，脱离了人民，我看，这才是本质。”

梁培璜又站起来，连声说：“是！是！是！”

徐总扬扬手，叫梁培璜坐下，说：“随便些，你也不必过分紧张。要懂得这些道理，需要一个过程，不是那么容易的。”

梁培璜坐定后，徐总问道：“关于放毒的事，你谈一下吧。毒气是怎么制造的？阎锡山给你下放毒命令没有？”

梁培璜矢口否认放过毒气。

徐总立刻严厉起来：“这样说，你就不诚实了，我不希望你这样做。你顽固守城，作为敌军将领，我们可以理解。但你放毒，而且是你亲自召见临汾师范的化学教员以后，制造出毒气和硫磺燃烧弹的。你知道吗？你已经违背了战争中不得使用毒气的国际公约。尽管你可以不承认，但我们可以根据确凿的证据，惩办战争中制造和施放毒气的罪犯。”

梁培璜语结了许久，才吞吞吐吐地说：“因为这件事太严重了！阎锡山是同意过临汾使用毒气的。”

徐总马上鼓励说：“有了这个认识就很好！”接着又问：“你越过汾河，打算往哪里逃呢？”

梁答：“我估计去太原的路都堵死了，我计划往西安跑。”

徐总说：“路那么远，又都要经过解放区，到处是天罗地网，逃不了喽。”接着又问：“我们这里伙食不大好，还吃得惯吗？”

梁答：“我吃的比看管我的解放军战士的伙食好，我真诚感谢共产党对我的宽大政策。”

徐总说：“先不必说感激的话，要先把情绪稳定下来，休息几天，我们再找时间谈。”

敌工部的同志把梁培璜带回住所后，徐总问参谋处长梁军：“梁培璜的家属找到没有？”

梁处长回答：“据37旅报告，梁培璜的家属已经安顿好了。”

徐总指示：“叫王诚汉（37旅旅长）派人把梁的家属送来，叫他们住在一起吧，过些天再往后方送。”

梁培璜从徐总那里回到住所以后，就分别给儿子梁保骥和亲戚写信。给儿子的信开头说：“我已到达解放军后方休息，解放军多方优待，刻下平安，不必悬念。其他至亲方面，亦可便中略告。”给亲戚的信开头大同小异，只是后面嘱咐把家中病人送医院治疗，并说，“按人民政府规定：被俘军官之家属，愿回家的回家，路费不够的帮助，无家可归的、安分当老百姓，不能生活的救济。所以病人住院后，也可由院方向临汾市代请救济”。

后来，在决定送梁培璜等高级战俘到河北省永年县学习时，徐总还请梁培璜等人吃了一顿便饭，勉励他们到后方好好学习，改造世界观，指出还有许多工作等待他们去做，寄希望于他们的学习收获。在谈话中，徐总是那样的关心他们，一再嘱咐：思想改造是个痛苦的过程，要否定自己的旧东西，接受新鲜事物，并不容易，既要有迫切感，争分夺秒，但也不要急于求成，容许思想上有反复。徐总还要他们在去解放区的路上，考察一下民情，听听农民斗争地主的诉苦会，看看支援前线的民工们的精神面貌。并勉励他们经过学习和改造后，将功补过，为打倒蒋介石、阎锡山的罪恶统治贡献才智。

在临送梁培璜到永年县时，徐总特别指示敌工部一定要清理好梁培璜的私人财物，带够换洗的衣服，带一些生活费用，以便他到了永年学习时手头宽裕些。

梁培璜到永年后，学习进步不慢。1948年6月20日，他联合

一起学习的阎锡山部队被俘的高级将领（其中有少将师长徐其昌、少将副师长汤嘉漠、中将司令刘光斗、中将副军长张翼等十多人）联名向晋绥军（阎锡山的部队自称晋绥军）的老长官、老同僚、老部下与全体官兵发通电，指出“人民必胜，阎蒋必败”。通电最后一段说：

“我等身受人民培养，不知怀德报本，反而助阎为恶，桑梓父老，蹂躏备至，滔天之罪，擢发难数。解放之后，深知今是而昨非，抚今思昔，惶愧莫名。然旧日袍泽，仍在沉迷不醒，倘不早为之图，一日大军临城，覆巢之下，必无完卵，每一念及，不禁惆然。受本身之教训，略贡区区，望能回心向善，当机立断，相信人民解放军必然一本宽大政策，不咎既往，我等可为前车之鉴，勿再观望以自惆。大势所趋，言出肺腑，何去何从，善为择之，临颖神驰。恭候勋祺！”

此通电全文，发表在1948年7月10日中共华北局出版的《人民日报》上，当天石家庄人民广播电台也全文播出。当时，18兵团的部队正在晋中榆次、太谷、祁县、清源地区打仗，无法及时看到《人民日报》。兵团政治部从新华社播发的新闻稿里抄收到梁培璜等人的通电。徐总看了通电很高兴，连连夸奖梁培璜、刘光斗等人学习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并指示政治机关翻印通电，向阎军官兵广泛散发。

写到这里，想起徐总在武安县冶陶镇释放一批阎锡山部队被俘的高级将领，并给1945年在上党战役中被俘的阎军第十九军中将军长史泽波饯行的事。徐总十分关切史泽波返回太原后的地位、处境和安危，对史说：“你回去后啥也不要谈，凡共产党的好处，你可以一句也不谈，只要你回到太原就行了。你还活着，共产党没有杀你，这就是最好的宣传。见到你的人，或听说你活着回来的人，他们就会想‘共产党连史泽波都没有杀，还会杀我们吗？’你说对不对？”史泽波连连点头。

1948年六七月，徐总指挥了晋中战役，歼灭阎军十万余人，

活捉阎锡山的绥靖公署副主任兼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綬。赵承綬是阎锡山手下的三个上将之一，也是徐总中学时代的朋友。他被送到兵团指挥部后，徐总立即召见他。当赵承綬进屋时，徐总挪动一把椅子叫他坐下，以老友相见的口吻问道：“萃崖（赵承綬的字）呀，你还认识我吗？”

赵承綬把头微微抬起来，看着徐总回答：“怎么不认识呢，是子敬（徐总的字）吧？”

徐总说：“老同学了，你的眼力还不错嘛！分手这么多年，你还很壮实嘛！”

赵承綬说：“说来惭愧，还说什么壮实！”

“哈，还满有点‘英雄’气概啊，是不是准备为蒋介石、阎锡山自杀呢？我可以成全你！”

赵承綬嗫嚅着说：“不是这个意思，我感到对不起你。”

徐总说：“你看你胡扯些什么呢？晋中决战双方死伤几万人，难道是我们老同学间谁对不起谁的问题吗？”

对赵承綬这样一个曾经与我军顽抗的战俘，这样以旧友情疏导谈心，只有博大襟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才能办到。徐总接着说：“萃崖，你为阎锡山卖命打了这么多年仗，到现在还认不清蒋介石、阎锡山这些人吗？还想为他们去殉葬吗？现在过来了，我们欢迎你。过来就好嘛，什么惭愧呀，或者恐惧呀，懊悔呀，等等，一齐抛掉，学些为人民做好事的新本领。要知道，还有许多事情等着你去做。”

赵承綬半信半疑，说：“我能吗？”

徐总说：“怎么不能呢？第一，到了后方，好好学习，改造思想，你学习进步了，就会影响你的旧部；第二，太原城里有你一定的社会基础，熟人多，朋友也不少，协助我们做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认清形势，选择自己应当走的道路。你看，史泽波、李佩膺不是都回去了吗？梁培璜、刘光斗、张冀、徐其昌在后方学得不错，很有成绩，还发了一份致晋绥军官兵的通电，我

看写得不错，你看到了吗？”

赵承绶回答说：“我看过。”

徐帅问：“有啥感想呢？”

赵承绶说：“我罪过比他们大啊！”

“罪恶大，怕我们杀你，是吧？那么好，我放你回去。你把阎锡山的精锐部队都丢光了，阎锡山正等着借你的头来惩办败军，推卸他指挥无能之责，来为他的晋中惨败消气呢。你决定吧，愿意用你的头去试试二喜子（阎锡山的乳名）的刀，我马上成全你。”

“我请求，不要把我送回去。”

“你这个糊涂虫啊！糊涂一辈子了，现在该醒醒了！”

徐总就是这样耐心而亲切地疏导，赵承绶渐渐显得轻松和愉快起来。徐总把话题一转，说道：“老同学了，给我提些意见吧，谈谈我在指挥上的缺点、疏漏。”

赵承绶说：“败军之将，要能看出你指挥上的缺点、疏漏，还能走到这一步！”

徐总说：“你这一步走得好，再不要惭愧了，应当高兴。早过来比晚过来好，如果你还在那边打仗，我们的战士的子弹，可就认不清你赵萃崖是我的老同学了！”

徐总以故友之情与赵承绶谈话一个多小时，再三勉励他安下心来，好好学习。临送赵回住所时，还说：“我等着你学习一段时间后，再请你回太原前线，聘你给我当参谋，咱们一起打太原。”

赵承绶不负徐总所望，太原战役开始不久，他就以“争取阎军工作小组”组长的身份带着阎锡山部队一批起义和被俘的将领，其中包括梁培璜等人，从石家庄来到太原前线，在徐总和兵团政治部胡耀邦主任的教诲和指导下，积极开展争取和瓦解守城阎军的工作。除争取到阎军的一些营、连单位起义和投降外，还争取到防守东山的阎军第八总队司令赵瑞率部起义。徐总和胡主

任曾多次请赵瑞吃饭，征询打太原和瓦解敌军工作的具体意见。

准备总攻太原时，徐总又多次听取赵承绶等人的意见。有一次，赵承绶对徐总说：“阎锡山把太原比作一个人，东山是头，城池为腹，南北两机场是臂膀，西山矿区是腿和脚。兵家攻太原，历来都是从东山这个头顶上起步，李自成如此，日本人也如此，最后取太原。这叫从头顶攻身子的战术。但现在阎锡山的头长得太长了，往东伸出30多华里，都是坚固设防的要塞和集团工事群。如果再从头顶上往肚子里攻，势必费时费力，不如大胆采取割头战术，掐住脖子，即从小窑头、淖马、山头和牛驼寨四大要塞一齐下手，置四大要塞以东于不顾。要塞以东是史泽波、李佩膺所部‘雪耻师’和‘雪耻团’的防地，史李二人受过共产党宽大政策的教育，对形势有所认识，对前途不能不自重，势必防守不坚，可以不必顾及。如四大要塞到手，太原孤城也就是囊中之物了！”最后，赵承绶还说：“夺取四大要塞，伤亡必很大，就怕我的建议是个孬主意。”

徐总激动地说：“我们想到一块去了，怎么是个坏主意呢？这说明，你为打太原是费了心力的。”徐总听取赵承绶的意见后，先夺四大要塞的决心更大了。结果，我军攻打四大要塞之时，史泽波率部逃回太原城内，李佩膺则率部向我投诚。从而使我国比较顺利地攻下四大要塞，为夺取太原城打开了大门。

总攻太原城的前一天，赵承绶还遵照徐总的嘱咐，进入敌人防区前沿，到阎军一个团部，亲自打电话给阎锡山的“绥署”副主任、上将城防司令王靖国，劝王走北平傅作义将军的路，绝路求生，献城起义。王靖国拒绝了赵承绶转达的我军对他的最后争取，但王劝赵不要进城，防遭梁化之（阎锡山的表侄、特务头子、“绥署”副主任，为人凶狠残暴）杀害。4月24日我军总攻太原城垣，仅用4个小时即夺取该城，结束了解放华北全境的最后一仗。

山西解放后，赵承绶任省政协副主席。赵承绶长期为阎锡山

效劳，多亏徐总当初在晋中战场上，对他那样温暖和朋友般的帮助。

在徐总身上，真正体现了我党无产阶级革命家不谋私利、不报私仇和化干戈为玉帛的博大襟怀。徐总关心敌方被俘人员的教育和改造，并大胆相信他们，使用他们，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采纳他们的合理建议。正是这样，当年的顽敌，象梁培璜、赵承绶等人，终于得到改造和进步，成为新人，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和工作。

策反汪伪“财神”邵式军纪实

冯正武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党集团出于反革命的需要，残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他们强加给刘少奇的一条重要罪状，就是诬陷他1941年派冯少白“与陈公博、周佛海勾结”，以便“向日寇投降”。因此，与此密切相关的策反汪伪政府税务署署长邵式军的行动，也被加上了大逆不道的罪名。打倒“四人帮”后，纠正了刘少奇的冤案，策反邵式军一事才得到澄清。笔者曾为策反邵式军的当事人之一，记述当时的前前后后，对于了解有关史实是不无好处的。

上海滩的“财神”

40年代初，上海爱棠路有一处阔气的花园洋楼，浓荫蔽户，陈设豪华，便是汪伪政权税务署署长、被称为上海滩上“财神”之邵式军的官邸。邵住主楼，其西侧四栋三层楼，邵的亲戚蒋大炜和蒋定一各住一栋，另两栋为警卫、司机及佣人所住。

邵式军又名啸越，抗战前毕业于复旦大学，其妻蒋冬荣亦为复旦同学。蒋冬荣之父蒋百器曾任浙江省督军，后隐居上海。蒋冬荣是蒋大炜、蒋定一兄弟的姑妈，同乡宗室至亲。她的舅父吴启鼎抗战前曾任上海市税务署长，颇有资财。

八·一三沪战爆发，吴启鼎急于随国民党向武汉迁移，将设在外滩六号的税

务署委托其外甥女婿邵式军代管。日寇侵占上海后，任命邵式军为苏浙皖三省税务总局局长。邵式军得此肥缺，广征苏浙皖三省及沪宁两市的统税（纱布、火柴、淮盐等），加上新增烟草、丝麻、医药和酒精，以及旅馆、筵席等消费特税，大发国难财。1940年汪精卫“还都”南京，将“苏浙皖三省税务总局”改称“财政部税务署”，邵式军又由局长擢升为署长，直接控制着伪政权的财源。

冯少白秘密抵沪

冯少白，又名冯龙、洪隆，是我的胞兄。抗战前只身东渡，于日本明治大学和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经亲戚介绍，任蒋鼎文的特务营长。在日本读书时，受过郭沫若、郁达夫的教益。西安事变后，与林伯渠有情报关系。抗战爆发，随林伯渠到延安参加革命，曾任抗大军事教员。1938年7月，经林伯渠、罗瑞卿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偕陈昌奉、马乃松等30余人到豫东开辟根据地，初任豫东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后任皖北人民抗日自卫队副支队长，1939年调新四军军部任参谋处科长。

1941年12月间，冯少白根据组织决定，为打破日、伪、顽对我的经济封锁，并争取、分化和瓦解敌伪上层分子，准备潜入上海，利用他姑母蒋冬荣、姑父邵式军的上层社会关系，秘密进行活动。此前，邵式军经我工作，已暗中向我党抗战事业给予过资助。因此，冯少自行前接受了刘少奇的指示，携带了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给邵的亲笔信。抵沪后，将陈毅的亲笔信交给邵式军。邵式军为了进一步表示对抗日的诚意，即拿出老法币四万元（当时折合黄金200两），买回一批药品和医疗器械送给新四军。另外，新四军在沪采购的一批军用物资，被税务查缉处扣押，由冯少白的亲戚蒋大炜关照其下属，免验放行。

1942年12月间，组织上又派少白去沪做敌伪工作。当时，苏德战场上，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吃败仗；在中国战场上，八路军、